

一冊。代譯式慈以大乘經式，小乘經式，大乘明以華經，式卷。

宰相圖，共裝四十冊，惟四百十四冊。以于宇文謙函經，音韻目

一。式一三平以日本足邊書經論明之藏印薩勝為原本，而以四號

(十) 藏印轉舍大藏經，藏印轉舍大藏經，藏印轉舍大藏經

元代白塔寺史迹考

千一百六十八卷

藏印轉舍大藏經本，惟百十八冊，惟千六百六十二卷。

十三卷至一十三卷) 至藏經三平卷五系以藏印薩勝為原本。(卷百

(六) 藏印轉舍大藏經，藏印轉舍大藏經，藏印轉舍大藏經

藏印轉舍大藏經，藏印轉舍大藏經。

此於尚書萬曆元平(一五三三)卷一六二〇) 五南京陵印的財

千一百四十一卷，惟一萬二千六百卷。

白塔寺位於北京阜成門大街路北，始建於元代至元十六年

(一二七九年)，原名大聖壽萬安寺，明代天順元年(一四五七年)

改名妙應寺。因寺內有一座建於元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年)，由尼

泊爾工匠阿尼哥設計建造的藏式白塔，所以俗稱白塔寺。白塔寺

歷經七〇〇餘年歷史，備受歷代各階層人士的崇奉和青睞，屢經

修繕，香火旺盛，文化活躍，不僅在北京宗教文化史上產生過重

要影響，而且在漢藏佛教文化交流上也發揮了積極作用。一九六

一年國務院頒布為全國第一批重點保護文物。本文謹就元代白塔

寺的興建、規模及宗教政治影響略作考述。不妥之外，願請專家

學者指正。(四〇) 北京陵印，共裝四十一卷，惟一千六百六十二卷。

一、塔、寺興建時間

惟六千三百三十一卷。

至一關於白塔的興建時間，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人們以為白塔建於

二百二十冊，刻錄出經。

藏經一合五卷兩冊，四冊四千一百餘卷，惟二萬三千餘卷，代裝

更存林以澤邊與由山古藏與彭藏藏為原本，合氏「中華大

晉察冀一帶，日軍當初對田三光劫掠，殘苦之計不遺餘力。

五藏州，惟原長北京新華大學印，一式三平平黨，當朝佛經類五

卷至，以藏垂手回對，應輝之續，兵軍六人辦抄。更番察晉悉科

倉于戰於，並毗卷儀大只，兵軍敵決匪彭，盡古音味服使，日軍

斬之顯，命其顯只以去，並民為察察一人冊，辨人網登錄二十師

顯于敵殊，因顯發只一數，兵五藏州樂軍中學同學劫之新察晉五

藏于劫奪，寺僧歸靜晉察冀後舉類同令新一劫，藉以圖實回亦，

樹括：山西歸州藏晉商內馬本館藏大藏經

對對凡十式大藏經光卷金。

遼塔之基，多執遼壽昌二年建塔之說。最早持此說的是明劉侗，

於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其後許多北京史料因襲此說。直到本世

紀五十年代，有人對壽昌二年之說提出異議，提出元代時建塔新

說，但終因依據不足，未成定論。六十年代初，北京大學考古學

家宿白教授在查閱佛教文獻時，偶從元朝如意詳邁的《至元辨偽

錄》中發現了元代建塔時所立碑石的碑文——《聖旨敕建釋迦舍利

靈通之塔碑銘》，並詳加考注，撰文載於一九六三年第一期《考

古》雜誌上。這才糾正了長期以來關於白塔創建年代的種種誤

傳。關於白塔的始建時間，碑文載曰：……

初，舊都通玄關北，有永安寺，殿堂廢盡，惟塔存焉。……

因罹兵火，荒涼蕪沒，每於淨夜，屢放神光。……奉御禿列奏其

祥瑞，上聞而信之，欲增巨麗，俾開舊塔，(發現香泥小塔無

數、舍利和「至元通寶」銅錢)……即至元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帝

后閱之，愈加崇重，即迎其舍利，立斯寶塔。

從這段碑文可知，白塔始建於元至元八年，即大元一二七一年。

白塔始建時間的確定，解決了白塔寺歷史上的一大疑案，同時，為廓清白塔建成時間，元代大聖壽萬安寺始建與建成時間也提供了重要依據。在白塔碑文未被發現之前，元代史料中已有塔寺建造時間的重要記載。如：「[元至元二十五年夏四月，甲戌，萬安寺成，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①，「[至元十六年建聖壽萬安寺，浮圖初成，有奇光燭天，上臨觀大喜……]」②等等。遺憾的是這些史料載明了白塔的建成時間和萬安寺的始建與建成時間，而唯獨沒有記載白塔的始建時間。正由於這個緣故，再加上明清北京地方史料對白塔始建時間的錯誤記載，人們長時真偽難辨，對塔寺始建與建成時間一直是各執己見，莫衷一是。白塔創始時間的確定為了解塔，寺建時打開了重要窗口，以此為依，再參照前面所引兩則元代史料，我們不難得出如下結論：白塔始建於元至元八年（一二七一年），建成於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年），經八年建成；萬安寺始建於至元十六年，建成於至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年），經九年建成。這個結論既符合建築工程進度比較客觀實際，也不違當時白塔寺史實，是無可置疑的。

二、塔、寺興建的因緣

白塔寺是元初興建的藏傳佛教寺廟，為何元世祖忽必烈在開國之初為藏傳佛教大興土木，修建這座塔與寺呢？這裏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推行宗教羈靡政策，密切與藏民族的關係。元朝在入主中原以前就開始了與西藏宗教的聯絡。相傳成吉思汗於一二

二三年西征東還，取道西藏，途經後藏薩迦派據地時，會見了當時薩迦派第四祖薩迦·班迪達（簡稱薩班）。成吉思汗送給薩班很多禮物，並表示征服天下後，請他來內地弘法③。之後，闊端汗仿效太祖，於一二四四年正式邀請薩班到涼州弘法。薩班在涼州與闊端汗磋商後，親筆書寫了一封《致烏思藏，納里速（衛藏阿里）各地僧俗首領的信》，勸說他們歸附蒙古④。薩班為西藏歸入內地中央政權邁出了大膽、理智的重要一步，為中國版圖的統一大業作出了巨大貢獻。繼薩班之後，薩迦派第五祖八思巴循着薩班未竟的事業，與元世祖忽必烈積極合作，終於使西藏正式歸入了元朝的版圖。時在一二五三年，歷史的成功經驗使忽必烈深深認識到藏傳佛教在民族關係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當元朝於一二七一年建立後，為確保多民族封建大國的長治久安，他繼續效法先祖，對藏傳佛教大興賜封，廣建寺塔。「元興，崇高釋氏，而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⑤藏傳佛教位居大都乃至全國諸教之上。忽必烈敕建的大聖壽萬安寺及其白塔正是這一宗教政治的產物。它巍然聳立，「坐鎮都邑」⑥，正顯示了元代藏傳佛教地位之崇高。

其次，祝厘祈福。元統治者都相信神靈、原本信仰薩滿教，當接觸藏傳佛教後，便以藏傳佛教作為主要信仰對象。忽必烈是藏傳佛教的虔誠信徒，也是元代統治者信奉此教的帶頭人。相傳這個教派的摩訶噶刺神（大黑天、戰神）曾保佑他作戰時屢戰屢捷，從而激發他信奉此教。但是，事實上忽必烈對藏傳佛教的篤信是通過接觸八思巴後萌生的。八思巴在忽必烈眼裏就是活佛。中統四年（一二六四年）作從八思巴受「威德喜金剛灌頂」⑦，在接受儀式上，二人平起平坐。他經常請八思巴為自己說法，並勸其妻子聽八思巴講法。他還以八思巴為國師、帝師、遵其言教。

「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尊為國師，授以玉印」⑧。至元六年（一

二六九)「升號帝師，大寶法王，更賜玉印。」^⑨。至元七年(一二七〇年)，忽必烈遵從八思巴之言，在大內大明殿御座上安置白傘蓋一頂，並在上面用素緞泥金書寫梵字，以鎮伏邪魔。^⑩從此以後，朝廷規定每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大內大明殿裏啓建白傘蓋佛事，並形成了大內的固定節日。忽必烈對藏傳佛教這樣虔誠的信奉，無非是爲了祈福降災、永保大元江山穩固。元代《聖旨敕建釋迦舍利靈通之塔碑銘》^⑪稱：「恒慮新都既建，宜卜永年，以福爲基，莫如起塔」。可見，忽必烈建此塔，寺與他崇奉藏傳佛教的目的是非常一致的，都是爲了達到祈天永命的目的。

再者，遼塔的發掘也是塔、寺興建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元代之前，這個地方也有寺廟和佛塔。寺稱永安寺，塔名「釋迦舍利靈通之塔」，皆爲遼代所建。大概是因爲遼金交戰，原寺塔遭受嚴重破壞，永安寺「殿宇廢盡，惟塔存焉」。當時塔上有銘文，文稱「大遼壽昌二年二月十五日顯密圖通法師道殿之所造也」。此塔寺常於深夜放出光明，附近的居民以爲失火，驚恐不安，由此引起朝廷關注。朝廷一位官員「奉御禿列」把此事奏報了忽必烈，忽必烈信佛篤深，遂下令開塔察看，結果發現了一顆舍利和一枚上鑄「至元通寶」四字的銅錢，另外還有香泥小塔等物^⑫。這一出乎意料的發現，使忽必烈自然也聯想到神明的冥助。因此，這一發現又成了忽必烈建立塔、寺的重要契機。

另外，塔寺的興建也與我國封建社會的陰陽五行學說有關，按中國陰陽學的說法：東方爲青龍之位，西方爲白虎之位；青龍是吉神，白虎爲凶神。因此，地居白虎必建重物，以姿鎮攝，方爲吉祥。這一傳統觀念在我國封建社會根深蒂固。忽必烈的重要謀臣，大都城的設計者劉秉忠就是一個熟諳我國古代陰陽術數的人物。史稱他「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⑬。忽必

烈敕令建塔時自然採納了劉秉忠的陰陽學說。白塔《碑銘》稱：「冀神龍之抉護，資社稷之久長」。又說：「新都造就，先創斯塔，托佛力之加祐，冀寶祚之永久，保大業之隆昌」。可見忽必烈主管、劉秉忠規劃修建大都，建立這樣的白塔正是爲了祈求神的庇護，賜福帝居、永保大元江山。

上述四個原因中，最主要的是前兩個，這是白塔及萬安寺興建的主要原因，也是元朝統治階級對待藏傳佛教的基本政策。

三、塔、寺的形制與規模

基於上述原因，白塔與大聖壽萬安寺在元初相繼興建，先後落成了。

新建的白塔位於大都西面平則門(今阜成門)內大街路北。「國朝建此大利，在都城內平則門裏街北，精嚴壯麗，坐鎮都邑。」^⑭忽必烈看到新建的白塔十分高興。「浮屠初成，有奇光燭天，上臨觀大喜。」^⑮看來十分符合世祖「取軍持之像，標馱都之儀」^⑯的願望。塔的形制來源於尼泊爾，稱覆鉢式或藏式，主要由塔基、覆鉢、相輪、塔刹四個部分組成。由於其主體的覆鉢和相輪兩部分形似佛教所用的「淨瓶」，所以一般又稱之爲「瓶塔」。瓶在梵語中稱「軍持」，所謂「取軍持之相」^⑰就是仿照淨瓶的形狀建塔之意。這種塔首次由阿尼哥從尼泊爾傳入漢地，所以它的傳入使當時漢地佛教藝術增添了新的色彩。

白塔由磚石砌築，建築雄偉，結構嚴謹。白塔通高五十點九米，底座面積一四二二平方米。塔基高九米，共分三層，每層向上收分二折，形成多面角亞字形狀，顯得堅實牢固，挺雄偉。塔基的最上層雕有二四個凸起的蓮花瓣，圍成蓮座。蓮座之上承托一個碩大無比，直徑爲九點七米的塔身，造型豐富、深厚。塔身

平面爲圓形，上肩略寬，像一個倒置的鉢盂。覆鉢式塔的名稱便是由此得來。塔身之上又有一個亞字形小須彌座，俗稱塔脖子。再往上是節節撥起，層層收殺的相輪，共十三層，故又稱十三天。相輪是佛教等級的標誌，有一、三、五、七、九、十一、十三之分，十三層代表最高等級的佛塔，也就是專供佛舍利的佛塔。相輪的頂部覆蓋一個結構複雜的華蓋，又稱天盤，直徑達九點七米，大有鋪天蓋地之勢，其四周懸掛着三十六串銅質透雕華鬘，每串華鬘下又吊掛一個小銅玲。微風吹過，銅玲叮噠作響，節奏分明。在華蓋上又豎起了一個高約五米，重達四噸的鍍金銅質塔刹，直入雲霄，在陽光下熠熠生輝。金頂銅玲這一動一靜的設計爲古老的白塔增添了生機和風彩。通觀整個白塔，設計精細，建築雄偉，正如史書所稱：「制度之巧，古今罕有。」^⑮

白塔不僅具有雄偉、奇特的造型，而且塔的內外還有許多精美的雕刻和陳設，這些是由當時亦憐真國師依照藏傳佛教「三所依」^⑯的內容進行佈置的。第一表示身業的內容佈置：先在塔底，鋪設石洞，雕刻五方佛石像，依其代表的方位加以佈置，並在其旁安立各種護法鬼神像。其次又在塔外須彌座上雕刻財寶天，八大天神等護法諸神像。再者，在瓶身之內安置諸佛、菩薩、明王等圖印、圖像。第二表示語業內容的佈置：將「佛頂無垢，秘密寶篋，菩提場莊嚴……諸法因緣生偈等百餘部大經典，一一又各造百千餘部」，放入塔身內，「夾盛鐵錮，嚴整鋪累」。第三代表意業內容的佈置是：先在瓶身之外雕五方佛，並刻其持物，以「表法標顯」；餘方單杵，南方寶珠，西方蓮花，北方交杵；「四維間側四大天母所執器物」。其次又取來我國以及近鄰印度、安息等國名山聖土，名貴香料，金銀珠璣、珊瑚七寶等物，摻雜一起，搗碎成泥，製成香泥小塔無數，放入塔中^⑰。以上這些雕刻和陳設是在七百多年前完成的。現在暴露於塔外的由於風

雨的侵襲和歷代不斷修葺，已不復存在了；在塔內的還從未啓封。根據一些古代塔藏品的出土情況看，它們完好無損的可能性極大。這些豐富的佛教文物不僅是忽必烈崇重藏傳佛教的又一佐證，同時對我們今天研究元代藏傳佛教及其藝術有很高價值。它是藏傳佛教文化藝術的一處巨大寶藏。

爲突出白塔的高大，神聖，興建的大聖壽萬安寺規模宏敞，在當時大都有「西苑」^⑱之稱。「帝制四方，各射一箭，以爲界至」^⑲。寺廟的方圓是按忽必烈的旨意，以白塔爲中心向四方各射一箭劃定的，也就是寺廟的四周離白塔各有一箭之遙。據查，古代的「一箭之地」有取堞一二〇、一三〇、一五〇步的、每步有五尺或六尺，因而一箭之地約合二〇〇米。從白塔往南至臨街山門的距離（即今白塔寺副食商場）恰合二〇〇米；臨街山門又正好在元代山門的位置上，這樣寺廟南北與東西的長度就各爲四〇〇米左右，由此可知原寺總面積爲一六〇〇〇平方米。寺廟規模之大從當時寺廟中舉行的重大活動可以看出。元貞之年，元成宗鐵穆耳在萬安寺舉行重大「國忌日」，皈依達七萬之衆^⑳。「自世祖以來，爲百官習儀之所，其殿陛欄楯，一如內廷之制」^㉑。寺廟能容納七萬之衆，它的寬廣、宏大不難想見。另外，從建寺工程也可見寺庵規模殊同一般。「至元二十二年（一二八五年）十二月，以中衛軍四千人伐木五萬八千六百，給萬安寺修造。」^㉒。「至元二十五年（一二八八年）夏四月，萬安寺成，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㉓工程浩大，耗費驚人，真可謂「竭生民之力以落寺宇者，前代未有。」^㉔遺憾的是，這樣大的寺廟卻沒有留下史料記載。姚遂《牧庵集》卷十一「普慶寺」碑記有：「至大元年（一三〇八年）（皇帝爲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建大承華普慶寺）……大抵撫擬大帝（世祖）所爲聖壽萬安寺而加小……亦大役也。」由此可知萬安寺與普慶寺建築格局是

一致的。趙孟頫《大普慶寺碑銘》中對普慶寺格局有詳細記載：「其南爲三門，面其北爲正覺之殿，奉釋迦金像，東偏爲智嚴之殿，奉文殊普賢觀音三大士。二殿之間，付（對）峙爲二浮圖，浮圖北爲堂二，屬之以廊自堂祖北，廡以周之。西廡之間爲總持之閣，中眞寶塔徑藏焉。東廡之間爲圖通之閣，奉大悲彌勒金剛手菩薩。齋堂在右，庖井在左。最後又爲二閣，西日眞如，東日妙祥。門之南，東西又爲二殿，一以事護法之神，一以事多聞天王，合爲屋六百間。」²⁸從這段記載可知萬安寺的大矮輪廓爲：一、白塔是寺廟格局的中心，這也正符合忽必烈建寺時射箭定四至的歷史事實。二、寺廟沒有鐘鼓二樓。萬安寺在元代有「騎馬搖鈴關山門」的說法，這說明寺廟沒有報時之鐘。因爲沒有報時鐘，就得借助馬匹在寺廟前後奔跑，以搖鈴吶喊關山門。三、寺廟殿堂衆多。普慶寺共有房屋六百間，而萬安寺比它要大，殿堂之多自不待言。至元二十二年世祖命四千中衛軍，伐木五萬餘棵修萬安寺。這麼多木材不知合多少殿堂？但足以看出其用材之多。

大聖壽萬安寺是元朝統治階級崇佛的產物。隨着元朝的滅亡，它也結束了歷史使命。「至正二十八年（一三六八年）六月甲寅，大都大聖壽萬安寺災。是日未時，雷雨中有火自空而下，其殿脊東鰲魚口火焰出，佛身上亦起火。帝聞之泣下，亟命百官救護，唯東西二影堂神主及寶玩器物得免，餘皆焚毀。」²⁹百姓們用勤勞和智慧興建的歷史巨構化作了歷史的泡影！

四、白塔寺在元代宗教、政治、文化上的影響

大聖壽萬安寺落成後，以寺中「坐鎮都邑」的神聖白塔和「一如內廷之制」的龐大規模，深得元代統治者崇重，香火長盛不

衰，在元代宗教政治、文化上產生了巨大影響。

元代統治者把萬安寺視爲「福田」，在大都劃分的五十坊中，獨以佛教意義將萬安寺所在地區命名爲「福田坊」。³⁰這樣命名，當然是因爲這裏有一座由忽必烈敕建，奉有「釋迦舍利」的大白塔。爲了讓舍利繼續發揮盛靈，無統治者把它作爲皇室祝厘祈福的專門物所。忽必烈敕賜的「大聖壽萬安寺」之名，就標明了這個寺廟爲皇室祝厘的性質。

元代皇室在萬安寺的活動十分頻繁。皇帝和其他皇室成員經常到寺中禮佛，燒香，參加佛事活動。「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年）十一月辛丑，（武宗）幸大聖壽萬安寺」³¹；「天歷二年（一三三〇年）五月乙亥，（文宗）幸大聖壽萬安寺，作佛事於世祖御容殿。」³²同時，還請帝師率藏地喇嘛來寺中作佛事，爲皇帝祈福。「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年），是歲，命帝師西僧作佛事於萬壽山……聖壽萬安寺……等所，凡七十二會。」³³「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年）：是歲，令僧羅藏等遞作佛事坐靜於聖壽萬安寺，涿州寺等所，凡五十度。」³⁴佛事頻繁，種類繁多，耗資十分驚人。「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廷（皇室作佛事）作佛事，供其費以百數者，用麵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萬七千三百斤。」³⁵忽必烈在位時，還特將稀世佛寶旃檀佛像請到寺中供奉。史稱這尊佛像爲釋迦牟尼佛時古印度優填王所造，東晉時由印度傳入內地。歷代輾轉傳播，遼時開始進入北京。元朝建立後，請入仁智殿。³⁶當萬安寺落成不久，忽必烈即令請到寺中供奉。「至元二十六年（一二八九年）乙丑，自仁智殿奉迎居於寺（大聖壽萬安寺）之後殿焉。」³⁷旃檀佛被請到萬安寺，這在當時確實是一件盛事，它對萬安寺在大都佛寺中的崇高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礎。另外，朝廷還把重要的國事活動選擇在萬安寺舉行。每年元朝的重要朝儀，包括「正

受朝儀」、「皇帝即位受朝儀」等「前期三日，習儀於萬安寺。」^{③⑧}這又大大地提高了萬安寺的宗教政治地位。

元代統治者不僅活着時熱心萬安寺，而且死後還要把它作為亡靈的依托。萬安寺內設立了多座神御殿（又稱影堂），有世祖的，裕宗的，世祖帝后的，裕宗帝后的，仁宗的，慶宗的等。

「成宗時，置世祖影堂於殿之西，裕宗影堂於殿之東。」^{③⑨}史書對此都有記載。這些影堂都立有專門名稱。「世祖曰仁壽，昭睿順聖皇后曰睿壽，南必皇后曰懿壽，裕宗曰明壽。」^{④⑩}設置了影堂不算，還要「月遣大臣致祭。」^{④⑪}祭日分常祭和節祭：「堂祭每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節祭之日清明，蕤賓、重陽、冬至、忌辰。其祭物常祭以蔬果，節祭忌辰用牲。」^{④⑫}這些完全暴露了元朝統治者崇佛的真正目的，那就是為了祈天永命。

大聖壽萬安寺的影響《寺僧的政治、經濟地位》還可以得到反映。萬安寺僧侶地位極高，尤其寺中的住持受朝廷冊封，享受世俗大司徒之位。萬安寺第一任住持知諫為忽必烈親自派遣上任，「至元二十一年（一二八五年），世祖皇帝建聖壽萬安寺於都城，召諫公開山主之。」^{④⑬}未上任前，知諫已是大司徒，史稱他「領釋教都總統開山三學都壇主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司徒邠國公知諫」^{④⑭}。可見地位之隆高。至順時，壇主嚴吉祥也是大司徒。「至順三年（一三三二年），復以司徒印給萬安寺僧嚴吉祥」^{④⑮}。嚴吉祥原本為司徒，由於他「盜公物，畜妻孥」^{④⑯}，曾被朝廷罷免。對寺僧加官進爵的同時，還大行賞賜。賞賜之物不僅有金、銀、珠寶等物，甚至田地，莊園、瑞鋪等也在其列。「至元十六年，建聖壽萬安寺，浮屠初成，有奇光燭天，上臨觀大喜，賜京畿良田畝萬五千，耕夫指千，牛百、什器備」^{④⑰}；「元大德五年（一三〇一年）二月戊戌，賜萬安寺地六百頃，鈔萬錠」^{④⑱}。寺廟的經濟情

況從寺僧的數量可以看出。「至順二年（一三三二年）丙戌，禧宗禪院臣言，累朝所建大萬安寺等，舊額僧三千一百五十人，歲例給糧，今其徒猥多，請汰去九百四十三人。制可。」^{④⑲}這麼龐大的僧侶隊伍足以顯示出寺廟經濟力量的雄厚，同時也反映了元朝統治者崇奉藏傳佛教的弊端和百姓們身上的沉重負擔。

大聖壽萬安寺政治地位的隆高同時也帶動了宗教文化的昌盛。元朝統治者為擴大藏傳佛教的影響，召集大批優秀的譯師、工匠將藏文佛經譯成蒙文、畏吾兒文，以推動藏傳佛教的傳播與發展。這一譯事活動就選擇在萬安寺開展。中央民族學院珍藏的《入菩提行論疏》蒙文刻本殘件載曰：「將《入菩提行論疏》於大都白塔寺雕版印行一千份，皇慶元年。」^{⑤⑰}又《柏林吐魯番蒙古文獻收集品》中，一份一三二二年的佛教印刷品殘件載曰：「餘受合軍之命，於鼠兒年夏月第一日初一日，於大都白塔寺內刻此 Bodisya canya avadar 經注，印行千冊，以傳衆生。」^{⑤⑱}這兩件印刷品都證明了白塔寺譯印蒙文佛經的事實。又吐魯番出土的畏吾兒文佛經《變神作品的題記》殘本載曰：「……這次翻譯最優秀作品的工作由迦魯納答思 *ḡāḡānā* 圓滿而無遺漏地實施並完成了，翻譯地點在大都精美奇巧的白塔寺中進行，時間是吉祥的虎年，十干之壬年，七月。善哉，善哉！」^{⑤⑲}這段題記不僅以生動的語言證明了元代白塔寺譯印畏吾兒文佛經的事實，而且還提到了具體譯師迦魯納答思。這位迦魯納答思是元朝著名譯師，《元史》中有他的傳。他為「畏吾兒人，通天竺教及諸國語，翰林學士承旨〔安載扎牙答思〕薦於世祖，召入朝，命與國師講法。國師西番人，言語不相通。以畏吾兒字譯西天，西番經論。既成，進具書，帝命鈔版，賜諸王大臣。西南小國〔星哈刺的威〕二十餘種來朝，迦魯納答思於帝師前敷奏其表章。諸國驚服。」^{⑤⑳}迦魯納答思的事迹進一步證明了元代白塔寺譯印畏吾兒文佛經的事實。順便說明

一下，爲甚麼元統治者要譯印蒙文佛經呢？這是因爲蒙古石族原無文字，成吉思汗時就是採用畏吾兒文書寫蒙古語。《元史·塔塔傳統阿》云：「帝曰，（汝深知本國文字乎？）稱旨，遂命教太子諸王畏吾兒字書國言。」元朝建國後，忽必烈令八思巴創蒙古新字，至元七年而成，稱八思巴文字。雖然新文字有別於畏吾兒文字，但蒙古人對畏吾兒文習用以常，何況新文字還是根據畏吾兒文字而來。因此，畏吾兒文字在蒙古朝野中仍佔據重要位置。

隨着民族文化研究的不斷深入，白塔寺爲元代蒙古文和畏吾兒文譯印場所的事實已經得到學術界公認，而且還被推認爲我國最早的蒙文和畏吾兒文翻譯印刷場所。白塔寺作爲這一文化的肇端之地，它在民族文化上的地位和影響值得我們加倍重視和深入探討。

(完)

注釋

- ①、②⑥《元史·世祖紀十二》
- ②、⑬、⑳、㉑、㉒程鉅夫：《雪樓集》卷七《清涼國敏慧公神道碑》。
- ③黃奮生：《藏族史略》
- ④《薩迦世系史》（總文版）
- ⑤、③⑤《元史》卷二〇二《釋老志》
- ⑥、⑭《元一統志》卷一《大都路》
- ⑦《蒙古源流》卷四
- ⑧、⑩《元史·釋老志、帝師傳》
- ⑨《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一，王磐：《帝師行狀》。

①清代佛教大藏經《龍藏》第六五一；于：字函，如意祥邁《至元辨僞錄》。

②、⑬、⑱、⑳、㉑《聖旨敕建釋迦舍利靈通之塔碑銘》。

⑬《元史》卷一五七《劉秉忠傳》。

⑱即佛像、佛經、佛塔。佛像爲身所依，佛經爲語所依，佛塔爲意所依。

⑳《佛祖歷代通載》卷二一。

㉑《元史·成宗紀一》。

㉒、㉓、㉔、㉕《元史·五行志二》。

㉖《元史·世祖紀十》。

㉗蒙思齊《元代社會階級制度》。

㉘于敏中《日下舊聞考》卷五二。

㉙熊夢祥《析津志輯佚·城池街市》。

㉚《元史·武宗紀一》。

㉛《元史·文宗紀二》。

㉜、㉝《元史·世祖紀十三》。

㉞、㉟《日下舊聞考》卷四一，程鉅夫《旃檀佛像記》。

㊱《元史·禮東志一》。

㊲、㊳、㊴《元史·祭祀志》。

㊵、㊶《元史·文宗紀五》。

㊷、㊸《元史·文宗紀四》。

㊹《元史·成宗紀三》。

㊺柳思吉斡節兒著，道布譯文。

㊻里尼士《柏林吐魯番蒙古文獻收集品》，劉迎勝譯文。

㊼德國茨默《論古回鶻文頭韻佛教內容詩》，劉迎勝譯文。

㊽《元史》卷一三八《迦魯納答思傳》。